

热历史

古人耳中的“声景”

□朱恬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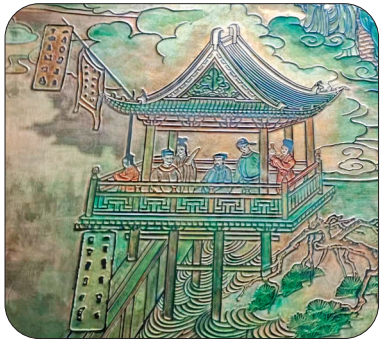
《礼记》认为，“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中国古人对自然环境的声景有敏锐感知，如“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等；苏轼的《石钟山记》，还专门记述了探究自然之声的经历。

各类地方志书更是保存了诸多对山水风物的声音刻画。例如，“涧中泉流不绝，风水相遭，篁涛间作如奏乐然”（《桂东县志》），“浮龟山……每遇阴晦闻有音乐鼓吹之声”（《宁国府志》），“泉流石罅，淙淙有声，恍如丝竹，四时不绝”（《罗定州志》）。

在《齐物论》中，庄子提出了“人籁”“地籁”与“天籁”之分。“人籁”指的是人为造成的音乐等，“地籁”指的是风穿行于山林之间发出的声响等。其中，山水风雨相交的自然之声，成为世人敬畏乃至崇拜自然的契机，亦促使人们想象出一种听不见的“天籁”。

古人善于听声，也善于用声，继而有意地营造听觉与视觉相交融的景致。位列“四大名园”行列的个园，其南面高墙上就留有24个圆形的风音洞。风吹过孔洞时发出的声响，让人会联想到冬天呼啸的西北风，并与园内的石笋翠竹视觉景观形成“冬去春来”的意境。

明代造园家计成在《园冶》中系统总结了古典园林造园技法，提出园林营造可以通过动静结合、内外相应、移步变声等多种方式，使各种声音和谐交织。他写道，“萧寺可以卜邻”，梵音到耳；紫气青霞，“鹤声送来枕上”；夜雨芭蕉，似杂鲛人之



▲忻州市繁峙县岩山寺文殊殿金代壁画（局部）中的古人生活场景。



▲清代光绪年间，粉彩百鹿纹尊，山西博物院藏。

本文图片 记者 刘亚 摄

泣泪；溶溶月色，瑟瑟风声，静扰一榻琴书，动涵半轮秋月。

据统计，《园冶》一共提及13种自然声、8种人工声，尤以鸟鸣声为



▲清代嘉庆年间，粉彩婴戏图碗，山西博物院藏。

最多。这些不同种类的声响共同营造出自然和谐而又富有人文气韵的声景，构成中国古典园林独特魅力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人籁”与“地籁”在此相互唱和，臻于巧夺天工的境界。

当然，声景不仅是一个文人雅士专有的精致概念。从街巷弄堂里小商贩的叫卖声到公园绿地的广场舞音乐，从评弹的曲调到庙会活动的嘈杂喧闹，甚至一间屋内的会议、一个人耳机里播放的音乐，都可以成为微观意义上的声景。这些微观乃至个人的小声景因时因地因人而变，具有千人千面的独特性。

从城市的角度来说，外滩海关的钟声，可以和东方明珠塔一样，成为上海的标志符号；建筑工地接连不断的打桩声，可以与“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标语一同，代表城市发展的加速度；至于江岸码头轮船的汽笛声，更是凝结了很多市民关于工作与生活的集体记忆。

总之，从古人的听声塑景，到现代城市里大小声景的唱和呼应……声景是声音的汇聚，也是时代的象征。

（《新民晚报》）

史海钩沉

轺车：古代驾驶的轻便车



□黄建强

作为一种出行工具，车在中国出现的历史很早。马车在中国起码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古代马车除作为战争工具外，主要为王公贵族出门乘坐，是权力与身份的象征。成语“驷马高门”，指的就是门第显赫。

古代驾驶的轻便车

轺车，是古代驾驶的轻便车。在我国古代史书中多有记载。《墨子》载：“杂守以轺车，轮毂广十尺。”《晋书·舆服志》也载：“轺车，古之时军车也。一马曰轺车，二马曰轺传。汉世贵辒而贱轺车，魏晋重轺车而贱辒。三品将军以上尚书令，轺车黑耳有后户，仆射但有后户无耳，并皂轮。尚书及四品将军，则无后户，漆毂轮。其中书监令如仆射、侍中、黄门、散骑、初拜及谒陵庙，亦得乘之。”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轺车是古代一种交通工具，专供上层贵族、相、侯或者帝王乘坐的一种轻便马车。

舆服制度，是古代礼仪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用车马舆服制度来区分社会阶层的高低贵贱。古代驾车用马的多少，是周代遗传下来的礼制规定，包括车盖的颜色和

“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孔子当年入周问礼，鲁昭公给他提供了两匹四马驾的车，享受的就是“士”的待遇。

轺车是汉代官吏出行标志等级的车舆，汉制轺车有盖无帷，官民均得乘之，唯以盖之高低区分贵贱。

据《通志·器服》记载，天子法驾，驾六龙，金薄缪龙为舆倚较，文虎伏轼。就是说，皇帝所乘的马车，六匹马拉着，车的靠背上有黄金装饰的龙，车轼上绘有伏卧的老虎。

轻便轺车有多快

轺车何以名“轺”？东汉末年成书的《释名》说：轺，遥也。四向远望之车也。车厢无遮挡，视线自然远，车体轻快，自然跑得远。

轺车脱胎于古代的战车，轺车由一匹马拉，叫一马轺车。两马并驾一车叫“骈”，驾三马的叫“骖（cān）”，驾四马为“驷”，用六匹马，称“六驂（fēi）”或“六飞”，迅疾如飞。

汉代轺车坐两个人，一为驭夫，一为乘客。轺车轮大车速快，故叫“轻车”，是最常用的公务用车，譬如驿站的轺车叫“轺传”。《汉书·高帝纪下》记载：“律，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轺传是专供

使者所乘之车。

轺车速度有多快呢？

《汉书》有一例故事，说昌邑王乘传车赶奔长安，日中时（正午一点）起程，晡时（下午三四点）已“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折合今制，昌邑王的车速在每小时15公里以上，这在火车问世前可谓极速，难怪跟班们策马狂追，竟至坐骑疲毙，躺倒一路。

周穆王时期，有个名叫造父的人善于驾车，传说造父在桃林一带得到8匹好马，调训好后献给周穆王。有一次周穆王让造父驾车打猎游玩，西行到昆仑山，见到了西王母，乐而忘返，正在这时，徐国有人造反，周穆王非常着急，关键时刻，造父驾车日行千里，使周穆王迅速返回镐京，得以平定叛乱。

轺车速度很快，但古代马车没有减震装置，快速奔跑颠簸不堪。所以在汉代，乘坐轺车虽能显示贵族为尊，但有帷盖的大车轺车更受青睐。到了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追求舒适，沉沦于享受，出行多喜乘牛羊车，轺车这种代表封建等级制度的官方配车，不再单纯是一辆快捷出行的便车，而更多地成为达官贵人炫耀显赫门第的工具了。

（《兰州晨报》）

生活史

古人计时习惯

古人把深夜称为“三更”和“半夜”，还要从古人的计时习惯说起。古人对白天和黑夜的计时和称呼都不相同，白天说成“钟”，黑夜说成“更”或“鼓”，这一点，我们从现在古人留下的钟楼、鼓楼上也能看得出来。在古代，城镇都没有钟楼、鼓楼，晨起要撞钟报时，所以白天都称为“几点钟”。古人把一夜分为五更，除夕夜的“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就是这个意思。

夜晚巡夜人员打击梆子，以点数报时，所以夜晚时间就称为“更”；有的地方是用击鼓方式报时，所以夜晚的时间还称为“鼓”，所谓的“几更天”或者“几鼓天”都是这个意思。我们常说的“晨钟暮鼓”也是源自这里。

《红楼梦》在大观园里过元宵节那一章中说：“天未二鼓，戏演的是《八义》中《观灯》八出；三更时，贾母听罢女先生的《凤求鸾》；四更时，凤姐儿的笑话也讲完了，元宵节终于‘聋子放炮仗——散了’。”这就是“更”“鼓”用得最为明显的例子。

古人的一更相当于现在的19时到21时；二更是21时到23时；三更是23时到凌晨1时；四更是1时到3时；五更是3时到5时。三更为子时，正是半夜时分，也是夜间最为寒冷的时候，所以贾母这时说“怪道寒浸浸的起来”。贾府的元宵节闹到“四更”，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凌晨三点左右，可见贾府的元宵节是非常热闹的。

（《解放日报》）

文史漫步

幸运的晋侯苏钟



▲山西青铜博物馆晋侯苏钟（仿制品）

记者 刘亚 摄

晋侯苏钟是铸于西周厉王时期的成套打击乐器，由大小不一的16枚甬钟组成。每枚钟体上皆刻有能互相连接的文字，共355个。铭文完整地叙述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器物主人晋侯苏受王命讨伐山东的夙夷，取得胜利并得到封赏的事迹。这场战争在史书中没有记载，并且晋侯苏的名字与《史记》中记载的也有出入，该铭文内容可对晋国和西周的历史补充和校正，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

晋侯苏钟出土于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晋侯墓地8号墓即晋侯苏墓，现有14件收藏于上海博物馆，两件在山西博物院。一套编钟为何存放在两个地方？这还要从1992年北赵晋侯墓地的那场疯狂盗掘说起。1979年，著名商周考古学家邹衡揣着寻找晋国始封地的期望，带领考古队对位于曲沃和翼城两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工作持续了10余年，发现了近千座西周至战国时期的中小型墓葬和数万平方米的建筑基址。邹衡认为，天马—曲村遗址应该就是晋国的最初封地“唐”。长时间的考古挖掘引起了盗墓贼的注意，盗掘之风日盛。1992年初春，盗墓贼用炸药相继炸开了位于北赵村的两座大墓，持枪将文物盗掘一空。相关文物部门抓紧组建考古队开始对北赵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就在这一年的发掘间隙，8号墓又遭盗掘，包括14件晋侯苏钟在内的诸多器物流失到境外。后来清理8号墓时，仅发现两枚劫后余生的甬钟，这便是存放于山西博物院的那两枚。另14件甬钟流落到香港时，因钟体上的铭文是凿刻而非常见的铸造，被文物商当作赝品而无人购买。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在看到编钟的资料后，认为字体有古意，绝非后世伪造之物，当即决定购回这批编钟。因为贩卖者不知编钟及其铭文的价值，又急于出手，最终以较低的价格成交。1992年12月，这批编钟被运到了上海博物馆。后来，学者经过对铭文的研究惊喜地发现，它与北赵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的两件小编钟的文字竟可以联缀起来！这不仅证明了晋侯苏钟的来源，也证明了其是真品，更揭示了西周时期的一段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